



精彩电影暑期档

“一号”卫星本身是一个直径只有1米的球体，外表暗灰，飞在几百公里的高空，它的反光亮度差不多只有六等星，普通人在地面的夜空里肉眼基本看不见。既然卫星本身不够亮，那就给它配个亮的“伴侣”——科学家们在跟卫星一起入轨的第三级火箭上加装了一个叫“观测裙”的装置，这是一个表面镀铝的球形体。火箭一入轨，球体就自动充气撑开，变成一个直径好几米的大反光球，亮度能达到二到三等星，在夜空里非常显眼。

所以当年许多人（包括大刘）在院子里坐在板凳上，仰着脖子，在夜空里指着欢呼的那颗星星，其实不是“东方红一号”卫星的本体，而是这颗跟着卫星一起绕地球飞行的球体。

在章笛沙看来，“东方红一号”卫星是中国航天事业真正意义上的开端，它就像一座恒久长明的灯塔，不仅是一代代航天人前行的指引，也是这部电影跨时空叙事的源头。于是在电影里，他让“东方红一号”的轨迹被未来的“星舟二号”干扰，也让“东方红一号”的讯息穿越虫洞被“星舟二号”接收到——将这两个时代的航天器的命运紧紧缠绕在了一起。

而当《东方红》的旋律跨越65年，在2035年“星舟二号”的绝境中再次响起时，那一刻，先辈们就像漫天星辰，在最黑暗的时刻，为后辈照亮了回家的路。

这部电影查阅了大量史料，前后耗费7年拍摄。钱学森之子、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馆长钱永刚，钱学森生前秘书、中央军委科技委原综合局大校顾吉环，也被影片深深感动。顾吉环还从电影中发现很多与钱学森先生、与真实历史产生呼应的小细节——2035年的时间线与钱老1935年创作的文章《火箭》中提出的“征服宇宙”想法，恰好相隔百年；未来宇宙航行，也呼应了钱老在1961年的《星际航行概论》课程。

主演之一的高叶说，她看剧本时，读到当年航天先辈仅凭算盘、手摇设备去推演轨道数据，被深深震撼到了。的确，当观众看到6000多把算盘和手摇计算机同时敲响，看到诸多1970年的航天工作细节时，也能深深体会到，

2035年的航天成就，它的根就长在1970年那片贫瘠但充满希望的土地上。

科研人的跨时代共情

如果我们用现代创业的眼光去看待当年的航天前辈，那是一个条件极其艰苦的硬核初创团队——没有超级计算机，没有精密的高级设备。很多时候，海量的轨道数据推演，靠的都是算盘、手摇计算机和堆积如山的草稿纸。一代代航天人，就是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，硬生生砸开了通向宇宙的大门。

电影里吴磊演的赵吉虎，就是一个典型的六七十年代科研工作者形象：他扎根在艰苦的环境里，用最基础的工具，仰望最遥远的星空。吴磊说，演这个角色最大的难点，就是怎么去诠释老一辈那种“穷尽一生追逐理想的赤诚与决心”。

为了找到感觉，他会尽量让自己保持“长时间缺觉”的状态，唇焦舌干，沉浸式地去贴近人物。他说自己拍在天台仰望星空的戏时，感触特别深：当年的赵吉虎，根本看不到后来的航天盛世，但他就是笃定地相信着。而现在，他坚信的一切都成了现实。

而这种“穷尽一生”的坚守，其实是科研人的普遍状态，无论在哪个时代亦然——导演章笛沙在筹备电影

吴磊饰演1970年的航天工作者赵吉虎。

